

现代人及其敌人

Homo modernus et ejus hosti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序

現代人及其餘人

Modern Man and the Rest of Us

羅素·雅各 著

華夏出版社

现代人及其敌人

——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

Homo modernus et ejus hosti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人及其敌人/刘小枫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9. 4
(刘小枫集)

ISBN 978-7-5080-5158-1

I. 现… II. 刘… III. 施米特, C. (1888~1985)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105 号

现代人及其敌人

——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

刘小枫 著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8.625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记

1999年春，我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施米特的学术讲演，随后为朋友们拟创办的学刊《思想与社会》写了“现代性政治哲学中的刺猬”一文，先行在几位朋友中传阅。《思想与社会》因故出版推迟，我便借机拓展原来的论题：评述欧美学界的施米特研究状况，数成《现代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期的政治参与问题，数成《民国宪政中的一段往事》，原稿中的主要小节则扩展为《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

如今，这三篇旧文重新归拢结集，《现代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补充了一小节并更新了若干文献，其余两文一仍其旧。

笔者自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着手评介施米特，令学界同仁有的喜、有的忧——笔者觉得，这喜忧参半正好表明：此时向汉语学界提起这一思想事件，可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早了搞不懂，晚了错失时机。

什么样的时机？

从国际情势看，新的战事不断，使得现代性政治秩序的危机暴露无遗；从国家情势看，政制正当性的重建正在稳步开展；从学界的思想情势看，现代性精神秩序步入进退维谷之境。正当此时，重温宪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政治神学家施米特对现代性政治原则的批判，对于汉语学界当今的思考适逢其时。

刘小枫

2005年8月於中山大学哲学系

某些地方还有着民族和族群，但我们这儿没有，我的弟兄们，这儿只有国家。

国家？这是什么？那好！现在耳朵放尖点，因为，这会儿我要对你们说说诸民族之死。

国家叫做所有冷酷巨怪中最冷酷的巨怪。它还冷酷地撒谎；这样一个谎言从它嘴里爬出来：“我，国家，国家即人民”。

谎话啊！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论新偶像”，刘小枫译文）

目 录

前 记

现代性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 /1

这个人及其命运 /4

施米特的主要论著概览 /11

施米特研究一瞥 /32

施米特故事的各种讲法 /42

“法学中的神学家” /66

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

——从《政治的概念》到《政治的神学》

引子 /77

权利状态抑或伦理的自然 /91

民族性抑或政治性 /99

现代的正当性与政治抱负 /107

对政治的“政治”理解 /113

地上的政治与宗教 /126

后现代自然状态中的敌人 /142

政治的神学类比 /157

人性恶与政治 /182

两种专政之间 /195

现代民主专政的政治神学 /212

施米特与马基雅维利 /230

施米特主要论著缩写表 /236

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

现代性政治思想争纷中的

施米特

2 现代人及其敌人

冷战时代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新的“主义”论争就从国际冲突变成了国内冲突。晚近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的思想斗争，在几个主要的思想国家重起烽火。汉语学界一时间仿佛也回到了论战迭起的三十年代，北美则好像回到了魏玛民国时期的思想混战。

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重新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思想状况，令人兴奋还是沮丧？

欧洲数百年、中国百年来的种种“主义”论争，伴随着大大小小的血腥战争。冷战并非口水战，而是血腥的热战，只不过战场不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而在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口水战和武力竞赛刚刚结束，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口水战和武力竞赛乃至热战就开场了。在和平主义带血丝的沙哑呼喊声中，战争不断向高科技水平升级。人道主义精神变成了这样的关注：导弹是否能准确命中军事目标，以免伤及平民。联合国“维和部队”本身成了一种讽刺：人类之间的血腥冲突仍然需要军事强力来克制。人们开始怀疑和平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过是空论，仅有对和平的善良愿望，无异于漠视战争中无辜个人的横死。

当冷战正打得热烈的时刻，施米特曾写道：

这个时代在抹去战争与和平的区分的同时，又在制造核杀伤武器：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可能停止反思划分敌友？最大的问题仍然在于限制战争；但是，如果战争在两方面都与敌对性的相对化脱不开干系，限制战争不是玩世不恭的游戏，就是发动一场狗咬狗的战争（dog fight），再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空谈（《政治的概念》，1963年版序）。

科索沃之战再次打碎了所谓“正义”战争的道义性质，对“正义”战争的正当性的质疑，不可避免会触及政治的正当性问题。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性问题。

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启蒙理性的产物，都要求依据人的自然权利重构国家，尽管这两种“主义”分别依据经验理性和历史理性对自然权利的理解相当不同，保守主义尽管反对启蒙理性，与这两种“主义”的对立仍然是家族内的兄弟之争。如今，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结盟对抗新自由主义，看起来是新的思想状况，其实很可能是两个民国（魏玛民国和中华民国）时期思想状况的重现。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中，施米特的政治法学的尖锐性重新凸显出来。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理学遭到的主要攻击是：政制统治法理基础中的道德价值被抽空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希望修改旧自由主义立场，声名显赫的德国法哲学家赫费虽然追随罗尔斯，却以为必须果敢地把道德问题纳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令人费解的是，既然赫费仍把实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作自己的主要论敌，又如何可能把被凯尔森剔除的自然法偷运回来，以便让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不至于道德薄弱？^①至于像 Stephen Holmes 那样吊儿郎当

① 参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庞学诩译，上海译文版，1999。

地描绘施米特、施特劳斯、麦金太尔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补充道德养分的努力更没有指望。

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和清理魏玛民国时期在比今天高得多的水平上展开的论争，当今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可能提高吗？

这个人及其命运

施米特 1888 年 6 月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而这个家庭却生活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小镇。小的时候，施米特就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古罗马拉丁传统的文学作品，在人文学中学念书时，还对语源学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尽管如此，上大学时，施米特念的并非古典语文学，而是法学。不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施米特一边继续研究新康德主义法理学，一边写论瓦格纳的华彩文章——施米特对文学的热爱终身不渝。1916 年，施米特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政治论著，由此拉开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序幕，而这部小书讨论的却是诗人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

1918 年至 1919 年之交，一场共和革命结束了俾斯麦建立的立宪帝制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的魏玛民国在动荡的时局中仓促形成。对于一些德国知识人来说，魏玛民国的建立与其说是令人兴奋的共和革命的结果，不如说是德国战败的民族耻辱的记号。德意志帝国的战败对关怀国家命运的德国知识人的刺激，有如甲午战败对中国知识人的刺激——在韦伯眼里，1918—1919 年之交的德国革命的真正含义是“大崩溃”。

1919 年，韦伯在大学作了著名的“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为愤怒而又沮丧的德意志精神打了一剂稳定士气的强心针。同年，施米特发表了《政治的浪漫派》，此书和随后出版的《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兴至无产者的阶级斗争》（1921）奠定了施米特在法学和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1922年，施米特受聘为波恩大学法学教授。在随后的十年里，伴随魏玛民国动荡的政治处境和思想混战，施米特论著迭出，对德国思想界乃至魏玛民国的政局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哲人海德格尔、文人恽格尔（Ernst Jünger）同被视为魏玛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思想领袖人物。其间，施米特换了两所大学执教——1933年，施米特获得柏林大学的教授职位，在这所大学一直呆到1945年俄军攻入柏林。

施米特不是书斋学者。尤其在魏玛民国后期，施米特卷入了复杂的现实政治。虽然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也不属于任何什么“翼”，但施米特的政治立场偏向自由民主的魏玛宪政的主要支柱之一天主教中央党，与该党高层人士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施米特与魏玛民国中央政府高层官员中的改革派也关系密切，甚至成了改革派首领、掌握兵权的国防部长施莱歇尔将军的幕僚。一向对纳粹党极为反感的施米特积极主张强化民国政府的总统制，以便对纳粹一类政党采取强硬的遏制措施。^①由此可想而知，纳粹上台后，施米特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在纳粹执政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希特勒不过是民国总理，纳粹党还得在魏玛宪政的框架中按规矩行事，尚未取代宪政制度施行以党代政的一党专政——这时，从来不问政治的海德格尔突然积极行动起来（据说曾写信给施米特劝其入党），^②极为轻蔑希特勒的施米特却变得相当悲观，感到自己因与施莱歇尔将军过从甚密将大祸临头。没想到，纳粹党中央高层主管法学的法学家弗兰克（Hans Frank）却欣赏施米特的才学，通过施米特的朋友拉他参与所谓整顿国家秩序的法律行动。经过一段时间观望——1933年4月24日纳

① 参见 Lutz Berthold, *Carl Schmitt und der Staatsnotstandspla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施米特与魏玛民国终结时的国家紧急计划》），Berlin 1999。

② 参见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北京：商务版 1999，页 327。

粹颁布授权法案之后，施米特改变了想法：授权法案奠定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也许，如今的强势总理倒可能结束一向疲软的内阁制，实现其直接民主与总统专政相结合的宪政改革构想，扭转濒临分裂的民国政局。

于是，施米特开始了与纳粹党人的合作，得到主管法学界（德国有庞大的法学专业人士）的纳粹党高层重用，卷入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法律革命”：除了参与制定一些重要法案，还被任命为高等教育界法学教授纳粹党员协会主席和纳粹控制的《法学报》主编，经常出入一些重要的大会场合。

人们当然还记得，一年多前，这位施米特还多次公开发表反纳粹言论，劝告政府取缔纳粹一类激进政党。如今施米特成了纳粹高层的红人，尤其让一些大学教授中真正的纳粹党员看了心里很摆不平，不断给党中央写信，告发施米特是“机会主义者”、企图“利用党的力量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倒可能没有说错）。与此同时，一位当过施米特学生的反纳粹人士叫古里安（Waldemar Gurrian），他流亡到瑞士后在那里办了一份流亡刊物，时常攻击施米特为变节分子（亦即没有坚持反纳粹），摘刊他当年的反纳粹言论，讥他如今是什么纳粹的“桂冠法学家”，甚至在刊物上抱怨说，党卫军的机关报干事太拖拉，迟迟不点施米特的名。

纳粹党员和反纳粹战士不约而同的揭发，使得施米特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为了保护自己，施米特的政治言论明显日渐纳粹意识形态化。然而，好景不长，1936年12月10日，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报》（*Das Schwarze Korps*）终于点了施米特的名，施米特随即被免去法学教授纳粹党员协会主席的职务。1937年1月8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监督部门（“受元首委托监督全党思想和世界观教育”的部门）对施米特作出了一个要他命的鉴定——施米特以往与一些犹太裔学者的交谊当然也成了罪状之一。

被党卫军机关报点过名的人，通常不是很快被枪毙，就是被押送集中营——施米特躲过这一难，纯属政治机运：1937年1月5日，希姆莱写信给第三帝国法学界领导人弗兰克说，他支持《黑衣军团报》的做法，可是，比希姆莱更有权势的戈林在此前不久（1936年12月21日）已经给《黑衣军团报》主编达尔坎（Gunter d'Alquen）写过信：

对施米特提出的具体指责，本身并非毫无道理，对此我并
不想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倘若谁都知道有
些人是由于我的信任而被委以高级公职，而他们却因您的报纸
受到如此屈辱，是不可容忍的。一个普鲁士国事顾问若有可指
责的地方，谁都可以自由地告到我这里来。如有必要，我自会
督办一切得做的事。但是，我不能容忍您以自己喜欢用的方式
对待普鲁士国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鉴于这种种情况，我请您
立即停止对国事顾问施米特教授的舆论挞伐——戈林（签字）。^①

对施米特的整肃行动因此不了了之——戈林这样出面保施米特，并非为了施米特，有可能的倒是，他担心党卫军势力借机要削弱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施米特因此捡了一条命，继续做大学教授，与政坛无缘，直到战后。

施米特一生可以说在政治上经历了两次大起伏。第一次就在1935—1936年间，施米特遭到纳粹党刊攻击后，随即受盖世太保监控；据说施米特一度产生流亡念头，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转而潜心著述，陆续发表了《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国际法的大空间秩序》、《陆地与海洋》等著作。第二次在1945—1946年

① 转引自马什克，《论施米特的“利维坦”》，见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大版2006。

间，当时，施米特在柏林被俄军拘押，随后移交美军。联军军管机关将施米特列为纳粹战犯的合作嫌疑者，拘押一年半。经过多次聆讯，纽伦堡国际法庭最终无罪释放了施米特。开释后，已经年近六旬的施米特没有能够重获教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小镇，潜心著述，直到去世。

幽居家乡的最初几年，施米特写了数十万字的涉及政治、法学、哲学、宗教、文学的思想笔记，完成了二战期间已经动笔的专著《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大地的法》，思想锐气不减当年。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条件日渐宽松，施米特重新论著迭出：《哈姆雷特或者赫卡芭》、《价值的僭政》、《游击队理论》、《政治的神学续篇》等等。

尽管经历过两次大的政治波折，施米特政治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在实际政治领域也如此。五十年代初，德国在美国军队监督下制订波恩基本法时，采纳了施米特三十年代（纳粹上台前）提出的宪法学说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比如：议会多数或人民主权原则也不可更改自由民主宪法中的基本成份；不能给予根本违背宪法中自由民主原则的政党以议会平等、必须对其实行党禁等等。

在思想学术领域，德国在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法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包括六十年代开始有影响的大家，仍与施米特一起思想。^①伽达默尔读到《哈姆雷特或者赫卡芭》后，马上写了评论，尽管他似乎没有搞懂施米特的哈姆雷特研究的思想意图；^②布鲁门贝格的成名作《近代的正当性》相当程度上是以施米特的“政

① 参 Dirk van Laak, *Gespräche in der Sicherheit des Schweigens: Carl Schmitt in der polit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沉默的稳妥中的交谈：早期联邦德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施米特》），Berlin 1993。

② 参 Hans-George Gadamer, 《诠释学 II：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洪汉鼎、夏镇平译，台北：时报文化版 1995，页 410—412。

治的神学”为起点的；^①青年哈贝马斯在自己的讲师资格论文中将施米特的论著作为学术权威大量引用。^②战后时期，即便存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仍然不断有形形色色的知名学者、教授专程到施米特退居的家乡小镇拜访这位高人——比如，保守主义的社会理论家格伦（Arnold Gehlen）、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大师雷蒙·阿隆、战后德国社会学的要人亦为施米特早年的学生薛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原子物理学家约丹（Pascual Jordan）、左派记者兼汉学家史克尔（Joachim Schickel），乃至身为犹太人的著名政治思想史家陶伯斯（Jacob Taubes）。

施米特在战后的影响并不限于德国。以色列国首任司法部长 Pinhas Rosen 上任后随即认真研读施米特的《宪法学说》，以此指导立国的法制建设；六十年代初，西班牙两所大学分别邀请施米特作学术报告（《游击队理论》一书的雏形）。1967年，中国的文革正进入武斗阶段，时在法国财政部任高参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访问东京后密访北京，返回欧洲时途经柏林，应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给左派学生会作报告。据陶伯斯回忆，当问科耶夫作完报告是否直接回巴黎，与施米特有书信往来的科耶夫说：“不，我要去 Plettenberg（施米特幽居的家乡小镇），当今德国唯一值得一谈的人在那里”。

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六十余年（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12年，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1985年，施米特以九十六岁高龄逝于慕尼黑，成为欧洲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超凡魅力人物。然而，盖棺却没有定论，反倒引发学界激烈的争议乃至极端对立的思想情

① 参 Hans Blumenberg, *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近代的正当性》），修订增订版 Frankfurt/Main 1983，页 99—113（涉及施米特的章节，中译见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版 2002）。

② 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版 1998，页 26，91、158、239—242、278。

绪，情形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引发的思想冲突和解释歧义不相上下。

冷战结束后，伴随社群主义和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大批判，施米特在北美学界也摇身为新左派和新右派都看重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施米特本人也成了二十世纪政治思想界的一大事件。虽然主要以公法学家身份闻名学界，有“二十世纪的霍布斯”之称，据说施米特还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一种重要传统、一类“德意志男人的独特命运”（小松巴特语）。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其学说，业内人士大都承认，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在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共和派理论家阿伦特语），其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语），“如今甚至开始盖过韦伯的光芒”（《法兰克福汇报》，1997年7月11日）。

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著作家，施米特都让人想起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至少从讲究写作的修辞以及雄辩文风而言，施米特看起来是在有意识地仿修辞大师西塞罗。就政治处境而言，西塞罗置身共和政制摇摇欲坠的时期，却力图挽回共和政体的命运，最终是自己的头颅被砍下来摆在演讲台上示众^①——为了挽救自由民主的魏玛宪政於危难之际，施米特挺身奋力讲演、著述乃至出庭为中央政府当辩护律师，在政权更迭后最后冒了一次险，最终背上了个纳粹“合作嫌疑犯”的历史罪名。

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大师雷蒙·阿隆给施米特下过这样一段定论：

施米特是个知识博大精深的人，他不可能成为纳粹分子，也从来不是纳粹分子。但他是个右翼学者、国家主义者，对魏

^① 参见格里马尔，《西塞罗》，董茂永译，北京商务版 1998；肖特，《罗马共和的衰亡》，许绶南、赵立行译，上海译文版 2001。